

独白

# 朱虹璇：

## “戏剧之光，引领我们无畏前行”

话剧九人驻城演出季将于年底与北京观众见面，届时，民国知识分子系列的五部作品会悉数亮相，其中，新戏《庭前》以律师夫妇郎世骞、尤胜男为主角，通过30年间的十余桩案件串起了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作为民国系列的收官之作，值得期待。此次，话剧九人的创始人、编剧、导演朱虹璇接受了《中国妇女报文化周刊》的专访，带读者了解“话剧九人”这支从校园走向专业的剧团舞台背后的故事——

人物简介

朱虹璇，青年戏剧导演、编剧、话剧九人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编导作品：《庭前》《春逝》《四张机》《双秤记》《对称性破缺》《征途》等。



朱虹璇在剧场

口述：朱虹璇 话剧九人编剧、导演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 我们的十年之约

“话剧九人”是一支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戏剧团队，自2012年成立至今，已经迎来第12个年头。选择辞职做戏剧，是一条鲜有人走的路。起初，我供职于咨询和互联网行业，对我来说，它们只是一份工作，是我打工的饭碗。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我白天上班、夜间写作。写作是我从来没有间断过的、非常喜爱的一件事情，所以“跨界”对我来说不需要一个非常铁腕的决心，或者说一次冲动。直到有一天，我终于不用再那么为房租、生计发愁的时候，我全职投入创作这件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当时，我也没有想过会做很久，只是计划先做个几年，把我想写的东西写了，就再回去上班，人总是要为生活考虑。我在2019年底辞职，成为一名全职戏剧人。不巧的是，我的创业才刚刚起步，演出行业就陷入了寒冬，话剧排练受限、演出被屡次取消。可是在那个阶段，如果不坚持，大家可能就会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是编剧和导演，我是那个挑大梁的人，如果连我都不肯坚持，那剧团就散了。

九人剧团有一段渊源，当时我们还是北大里的一个校园剧团，在毕业时，剧团的人在散伙饭的酒杯上一起立下了一个十年之约：不管未来从事什么行业、身在何地，每年我们都要聚在一起做一部戏，连演十年。我是一个比较重承诺的人，虽然“十年之约”是我和同学们在酒杯上的笑谈，但是我能比别人记得更牢固。

我们也有过做不下去的时候。当时我也很简单——硬撑，撑到10年。2021年是我们的10周年，2021年过了，我就不欠债的了，我也没有对不起当年我们一起说过的话的小伙伴，可以回去上班打工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发现团队里有一些人还想继续做戏剧，有更年轻的人甚至想要将戏剧作为他们的人生事业。这时，一种责任感从我心中萌出，我自问把他们的梦想和希望置于何地？于是，我决定再陪他们往前走一走，走到一个他们足够成熟，自己也可以继续下去的时候，我再回去上班。

当然现在，我可能再也不想回去上班了，我已经适应了创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不断地挑战难关，不断地背靠着背往前走是一件多么令人享受的事情。

我们剧团最艰难的时刻是账户里几乎没有任何资金了。付不出场地租金，我们不得不拼命找一些演出机会，四处奔波，像流浪者一样辗转演出。可是，当我们觉得已经豁出去了一切，却发现算下来半年只挣到1万块钱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绝望，因为我们还要支付剧团的运营费用，还要负担团队在外演出的食宿。我自问自己，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为了梦想已经拼尽了全力呀。

当时散伙饭桌上的同学，有几位或以美术设计，或以制作人、剧务的身份，一直陪伴我们坚持了10年，其中也有很早加入我们的伙

伴，从兼职逐渐转到全职，像我一样开始以戏剧作为一份事业。还有一些远在海外的朋友，其间从未回过国，甚至都没有看过一次话剧九人现场的演出。但出自他们之手的每一行字、每一首音乐、每一个图标，仍会不断被打磨、力求精益求精。

### 两颗星斗的交汇，一定会绽放出光亮

《春逝》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以温柔轻巧的方式讲述了“物理双妹”瞿健雄和顾静薇深情而克制的相逢、相知、相惜，乱世中物理所三人组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取舍的故事。剧中主人公的原型，是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顾静薇，以及中国著名现代剧作家、物理学家丁西林。

在最初进行《春逝》的创作时，我们并不被外界看好。有人告诉我，话剧市场主要以女性观众为主，并且女性观众更喜欢观看男演员和男性角色。他们认为，了解市场和观众喜好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写这样的故事，就应该强化男性角色或将主要矛盾冲突集中在具有魅力的男性角色身上。他们认为了解市场和观众喜好是很重要的。还有人认为市场上双女主题材的作品太少了，他们使用了“冷门”这个词，希望我不要期待这部戏会受到观众的喜欢。但其实我并不关注作品是否具有某种市场特点或流行度。首先，我不在意有多少人喜欢双女主。我创作这个故事的核心原因是，这个故事首先打动了我自己。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吴健雄这样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她的一生所经历的坎坷和她在意志上的坚持，直到现在依然是我的榜样。而顾静薇作为吴健雄的导师，曾经陪伴她度过了一年的时光。没有人描述过这段岁月，也没有人认为这段时光对两个女性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两个优秀的女性，在那个年代都在走少有人走的路的罕见的女性，在她们的人生旅途中彼此交流与相互启迪，就像两颗星斗的交汇，一定会绽放出光亮一样。

在我的人生体验中，当我遇到与我相似经历的女性前辈或后辈时，我们之间所产生的火花也同样如此。我们彼此给予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我非常希望创作这样一个故事，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记住历史上存在着吴健雄和顾静薇这样的人物，让更多人了解她们。如果这部戏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就足够了。每一部作品创作出来都会自然发展，如同命运一样。创作者不能过于固执地去控制太多，也不应该有过多的杂念。

在实际观看过程中，女性观众其实非常喜欢《春逝》。无论是在豆瓣上的留言还是现场的评价，观众对作品都给予了热烈的回应和支持。如果要问《春逝》的创作过程和我其他几部作品有什么不同，《春逝》可能是我第一次敢于在作品中袒露私人情感的一个作品，因为之前的戏我会在主题或者思辨性的内容上面琢磨得比较多，而写《春逝》的时候我想试一试，不去考虑那么宏大宏大的问题，而是去挖掘一些情感上幽微的东西。

最后《春逝》呈现出的效果还算令人满意，这给了我多一点创作的勇气和信心，所以在接下来的作品中，我也尝试了更多内心的剖白。比如像《双秤记》之所以被很多观众喜欢，一部分可能被其中一些思辨的交锋或者深度的思想性内容所吸引，还有更大一部分可能是被三个人的友谊打动的。三位男主角程无右、郎世骞、卢泊安于山河动荡之中展现出的知己之情、彼此间惺惺相惜，他们从少年时期始于微时，多年以后初心不改，三个人之间的情感互相勾连、互相羁绊，也是一个情理交融的故事。

不仅仅是《春逝》中的“物理双妹”，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中的女性角色，如《双秤记》中的邵玉琴、冯小寒，《四张机》中的马水仙、陈慧茹、古娜，《庭前》中的尤胜男，都以她们独特的光芒，组成暗夜中熠熠生辉的群星。有时候，创作者会自然地调用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或所处场合去诠释不同的人物，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创作规律。我其实很难回答“哪个角色是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作品中很多女性角色身上会有我的影子。比如《春逝》中的瞿健雄会和大学时期的我比较像，说话直接、不够圆滑。而《庭前》里面自在如风的宋筠，她也很像我，更像生活里的我，向往自由，不愿意受到传统的束缚……无论如何塑造，这些女性人物在剧中都不是“附属品”，她们都是充满女性力量的重要角色。

### 前路崎岖，我是你们的同路人

如同《春逝》中顾静薇和瞿健雄这两代杰出的女性物理学家之间的碰撞与交汇。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遇到了前辈们、同龄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初入职场的女性。我们这几代人相互影响、见证彼此的成长。当我们被围困时，女性间的友谊、鼓励、互助如前方如炬的航标，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就像顾静薇对瞿健雄说：“请你相信，世人的眼光或许分男女，微小的原子与核子却不会。我们的努力，终究是能看见的。”瞿健雄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会被认为专业能力不足，被建议不要报考物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科目，年轻女性无力挑战。即使她考上了庚子考试的第一名，也不会被送出国留学。因为社会天然地会低估一个年轻的女性能够坚持这样一个冷门学科并为之所付出的意志力和坚韧性。顾静薇是一个35岁的单身女性，她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年龄焦虑对于未婚女性而言是普遍存在的。

显然，瞿健雄和顾静薇是当时科学领域中的“少数派”，而“少数派”的定义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具象化的衡量标准里，比如在戏剧行业里面有多少女性创作者？从事导演这样工作强度较大的工种的女性的总体人数又有多少？像我一个北大政治学的，毕业后去干了咨询和互联网的工作，又出来全职做戏剧，这样经历的人也许确实是所谓的“少数派”。但是如果我们把尺度拉得长一点，将前人、后人都考虑进来，其实“少数派”也不是那么孤独。我常常能够在很多意想不到的时刻遇到一些同路人，发现他们也走在所谓不那么大众的路上，偏偏我们会被各种命运的机缘安排，让彼此相识，并展开很深刻的情感交流。

在这次广州驻城演出期间，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观众，她是东南大学吴健雄奖学金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是一位杰出的女企业家。在专程来看《春逝》后，她给我发了一段话：“谢谢你们努力，中国女性的韧力不亚于任何人，但尽在不言中的现实，让潜能流逝。我对生命中一切机遇感恩之至，刻刻不忘，终究为下一代女生扩大机遇基础，期待代代潜能可更大地尽情发挥，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散场时，这位前辈握着我的手说：“我是你们的同路人。”她没有多言，然后默默离开了。我相信她肯定也是一个走在少有人走的路上的优秀女性，那一刻，我并不因为我是“少数派”而感到孤单，反而充满了能量。尽管未来，我们也许不会有太多交集，但是我知我所做的事情有意义，而她看到了这样一场戏，她一定会觉得她当年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

我相信一定也会有看过《春逝》或者其他九人戏的其他观众，在自己的那条少有人走的路上会受到我们遥远的鼓励。“少数派”的定义在此时已不再狭隘。

这一次相遇也在激励着我。30多岁正是一个人年富力强的时候，虽然没有了从前的活力，虽然我时而在工作中会感到疲惫，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退缩。我们需要站到台前去告诉所有女性，女性可以有机会成为优秀的导演，可以不断创作，女性可以做很多事情，不需要惧怕任何不公平的眼光。

关注我们的观众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成长中的女性。在某种时间的尺度上，我们是她们前路上的背影，只要我们还在，她们就可以无畏前行。《春逝》的剧尾处，舞台屏幕上会打出的那一行字，“献给给同路同行的你”。那正是我要对她们说的话。



《春逝》剧照

### 听她们说



人物简介

张银俊，2006年发起创立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称：青爱工程），现任民进中央妇女儿童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全国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专家组成员、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主任、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记录：金勇  
口述：张银俊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张银俊 敬量 奉献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长期从事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的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最近变得异常忙碌。她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青爱工程现任形象大使康辉的抗艾巨幅宣传画也开始在各地热闹的购物广场等人流聚集地滚动播放。刚参加完湖南省2023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回京的张银俊，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她与艾滋病防治长达近20年的感人故事。

### 从青艾工程到青爱工程

做青爱工程，其实有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2006年前后，我曾在原卫生部杂志社担任社长一职。当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杀事件经常见诸报端，我们针对这一群体做的一项调研发现，除了公众认为的学习压力大之外，大学生自杀原因44%与情感、两性关系有关。其中一位女大学生的自杀原因是：她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这个调研结果深深触动了我，我是个母亲，我也有孩子，如何能让我的孩子避免类似的伤害？必须从源头抓起。于是，成立一个社会组织来推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2006年，在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教育学会的支持下，青艾工程正式启动，当时我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建青艾小屋。

万事开头难。我们借用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的“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用电影课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性健康教育的应用研究”课题组的名义，开始给各地的学校打电话筹集资金建小屋。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我给全国600多所学校打电话全都被一一回绝。

不光钱难筹，人也难招。曾答应要来青艾小屋工作的女孩也因为家人的反对而作罢。

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行为也不理解，纷纷劝我：“你这是在沙滩上建大厦！”

做青少年的性教育，就是在上游拧上了防治艾滋病的水龙头。这事儿有价值，总得有人做。别人不做，我来做。终于，在青艾工程首位形象大使白岩松的支持下，我们的第一间青艾小屋在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成立了。之所以叫“小屋”，是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寓意。

2009年，白岩松建议把原来的青艾工程改为青爱工程。这个名字我特别认可，我们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对孩子们深深的爱吗？我们给孩子们的不就是让他们学会自爱、学会爱人吗？

青爱小屋在全国的快速发展是从2014年开始的。之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各界爱心人士的热心捐赠，在2016年青爱工程启动十周年时，青爱小屋已在全国建成了625个，截至今年已经有1334个，遍及全国29个省份104个地区，直接受益人群有3000多万。性健康教育终于由原来的“禁忌教育”变成了现在青少年成长的“必要一课”。据统计，2022年新报告的艾滋病病例中，异性传播比例达到97.6%，说明我们当时的选择不仅是正确的并且是超前的。

### 从中国到联合国

今年基金会得了两个奖：一个是“爱的教育校园行”项目获得中华慈善奖；另一个是我本人获得了美国华人华侨联合会颁发的“国际妇女儿童教育成就奖”，获奖理由表彰我和我的团队在艾滋病防治教育与妇女儿童教育领域的贡献。说我们探索实践的“性教育防艾模式”，获

# 张银俊：我和青爱工程一起走过的岁月

得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预防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社会疫苗”。

获奖后，很多人问我，我们的“性教育防艾模式”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云南盈江县开展项目时，首先选择其中一个乡的6所学校成立青爱小屋做试点，并对学校负责这个项目的老师进行专业培训，慢慢再扩大试点范围，最后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对全县的学校实现了全覆盖。为了更好地管理，基金会在盈江县所在的德宏州成立了青爱工作基地。在我们的带动下，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妇联等部门也都行动起来，启动了云南省的青爱工程基地，与我们共建青爱小屋。就这样，短短三四年间，青爱小屋便从一个乡复制到一个县，甚至一个省。目前我们在全国累计培训的师资已达22000人次。

后来，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我们对伴随项目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比如，为了解决艾滋病孤儿的问题，我们在山西临汾资助了全国唯一一所专门收养和教育艾滋病孤儿的学校的用药和健康教育指导，现在第一批学生有些已经考上了大学。在做项目期间我们还救助困境儿童35000余人。为了提高家长的“防艾”意识，我们还在青爱小屋所在的学校开设“家长课堂”。

今年，为了提高全民的“防艾”意识，我们拍摄了大型公益电影《青爱》，电影由真实人物故事改编，聚焦艾滋病患者生存现状与困境，讲述了一段关于两个少年自我救赎和被救赎的故事，主创团队和演员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目前电影已经到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在明年上映。

我长期生活在中国，有朋友对我在美国获奖感到很奇怪。其实，这和艾滋病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有关，我们这个项目，联合国一直都在关注。

2015年12月，为了实现联合国在2030年实现“零艾滋”（零新发感染、零歧视、零死亡）的目标，当时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苏凯琳和我在北京共同发起了“天下母亲，以爱抗艾”国际公益签名活动，孩子和年轻父母成为签名活动的主力军。

2016年9月，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率团参观了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民族中学的青爱小屋，高度赞赏青爱的做法，并激动地说：“我们所从事的青少年性教育工作是最重要、最难做、最需要勇气的工作，希望我们把这些成功的经验推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与联合国有了工作上的接触，我们从2016年便开始申请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机构资格，2019年终于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获得咨商地位后，基金会先后参加的与联合国相关的活动就有37次。

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是：2017年3月13日，我参加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1届会议并接受专题采访，对母亲教育、女性赋权等相关议题做了重点阐述。此后，我陆续参加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66、67届会议。2019年5月4日，我应邀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与亚洲文明周”活动，代表亚洲女性呼吁关注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关注妇女赋权和妇女儿童教育等关乎亚洲发展最紧迫的问题；2022年9月，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的视频发言中，详细介绍了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取得的工作成果，并介绍了中国政府和民进系统的社会组织在西藏和新疆开展教育支边和普及防艾教育的经验……

我们以民间角度、民间语言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在人权发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艾滋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就。咨商地位的获得，为基金会深度参与民间外交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广阔舞台。这几年，我们收到的北京市外事部门的表扬信就有4封，称赞我们对外讲好了中国故事、北京故事，我自己也觉得挺自豪的。

今年的12月1日是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我们青爱工程的抗艾之路也走过了18个春秋。今年艾滋病防治活动的主题是“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零艾滋”的目标一定能完成，至少应该在我们中国率先实现。